

出版知识丛书

书籍 编辑学 简论

张玟 林克勤 著



中國書籍出版社

书籍编辑学简论

张玟 林克勤 著

中国

1987年

出版知识丛书

书籍编辑学简论

张玟 林克勤 著

中國書籍出版社

书籍编辑学简论

张 玫 林克勤著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北京现代图文美术社激光照排
天津静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70 千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

书号: ISBN 7—5068—0025—x / G · 15
定价: 3.40 元

《出版知识丛书》

总 序

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

与此同时，我国出版科研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央《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加强出版、发行的“科研工作”。根据这个精神，三年多来，我国出版界在出版科学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工作。首先，我们建立了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在好几个省市成立了诸如研究室、学会、研究会等这样一类组织和机构。在十多个高等学校开设了图书编辑专业和图书发行专业，兴办了更多的中等专业学校。创办了六、七个学术性或学术资料性刊物，召开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和研究会，先后交流了几百篇论文和学术性资料。出版科学方面的专著、译作、教材和教材性参考读物，也正在著述、编撰中。《出版知识丛书》的出版，正是出版科研

DMO 6/05

战线上许多新生事物中的一项。尽管我们在出版科研方面起步比较晚,三年多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出版科研事业的发展速度令人鼓舞,相信今后的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我们编辑出版《出版知识丛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展示和积累出版科研的成果,加强学术交流,进一步推动出版科研工作的向前发展;二是提供理论性知识性读物,为加强和改善出版教育、培养出版人材、加强中青年干部的业务培训,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服务。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出版知识丛书》的出版,不断总结我们在出版工作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使它理论化和系统化,赋予现代科学的形态,从而建立起我国出版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学,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为我国出版事业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为出版事业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服务。

编辑出版《出版知识丛书》是一件新事,是一种尝试,困难和问题一定不少。但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愿和广大的出版工作者一起,和出版界内外热心出版科研事业的同志们一起,共同努力。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月

前 言

——兼读后记

全国大约不下于 500 家出版社吧？过去却有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奇异现象：所谓 360 行，几乎都有专业书籍出版，唯独自己的出版专业却被忽视了，而且还大模大样，“安之若素”。这样对编辑业务特别是新生力量又怎能提高呢？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是“瞎子摸象”，很难增加全面而又有系统的知识。

正像“茶壶里的饺子”，闷在肚里倒不出来，不仅社会上一般人对编辑这一行当，蒙头转向，不少领导干部以至高层领导也不甚了了，有的竟然把编辑贬为“初级劳动”，不足道的；因为书稿是教授和研究员们写的，编辑不过随便弄弄，送到印刷厂去就完事，果真如此么？我干过几十年编辑，现在也还“藕断丝连”，对于这种外行人所说的一些外行话，不仅不以为然，而且大为反感；但这又能埋怨谁呢？只好“哑吧吃黄连”吧。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编辑学也被编辑出版工作者们“自己”重视起来了，论文、专著不断脱颖而出。出版、编辑专业刊物有中国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出版工作》、上海编辑学会主办的《编辑学刊》、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出版发行研究》、书海出版社出版的《编辑之友》，还有文汇报社的《读书周报》、《光明日报》的《图书评论》和《解放日报》的《读

书》等报纸副刊。这同过去相比，真可以说是“满天星斗”了。

这些报刊固然不是专门谈论编辑学的，但都与书籍密切相关，提供了不少活材料，从一定的量变到质变，它们必然会变成研讨编辑学的催生剂，再加上几十年来出版社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也是促使编辑学萌生、成长的酵母。张玟、林克勤两位编写的这本《书籍编辑学简论》，可谓空谷足音，群山回荡。

据我所知，这是我国唯一的一本比较全面而又有系统地发掘和论述书籍编辑规律的专著。人走多了必有路，从建国以来编辑工作的实践中，抽引出其中大量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加以提炼、发挥，这就是编辑学的基础。“学”是探讨、研究客观事物规律的，一切事物有源又有流，过去、现在、未来形成了一个轨迹，构成一条隐约可见的线路，显示它发展的走向。这本《书籍编辑学简论》也正是如此。它有史有论，史论交错，加以整理、编排，过滤出其中的精华，就成为一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专门学科了。


本书共分9章：第1、2、3、4章着重对书籍编辑的历史过程和书籍编辑职能及任务的叙述，勾勒出一个纵深切割的侧面，脉络清晰，纹理分明，从而增加读者对书籍编辑是什么，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有个大体的了解。这4章并不是平铺直叙的，第1章与第2章搭配，第3章与第4章相搭配，纵横交叉，体现出史论并重的特点。从第5章《书籍编辑学是一门科学》作为转折，承上启下，突出了高峰崛起的“灵魂”作用；顺流而下，第6、7、8、9这4章，阐述的多是编辑工作业务范围之内的具体规律。有虚有实，也就是说，既有方针原则，又有实践经验，两者相辅相成，密切结合，必然起到对认识和实践的引路作用。

本书具有理论和实用双重价值。对于老编辑来说，不妨进行“反思”，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彻底克服“左”的和右的两种偏向；并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从而开扩眼界，增长见识，使编辑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新编辑来说，它无异是本“入门书”，可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吸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编辑工作者先进的、革命的优良传统，少走弯路，健康成长。常言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阳关道”与“独木桥”似乎并不相干，问题是既然已经有了阳关道，又何必自寻苦恼地去过独木桥呢！这本《书籍编辑学简论》，对于编辑工作者来说，不正是一条坦坦荡荡的阳关道么？我认为正是这样的。

承作者不弃，让我写一篇“序言”或“前言”。我自知才疏学浅，难以应命；但还是接受下来了。于是从头到尾、一字不漏、仔细地读了一遍，也使自己对照过去的编辑工作做了检查，并深受教益。

如果作者能够多吸收些外国的新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我以为内容可能更新颖、更充实，如果能够对照今天的现实，指出滥出书的严重危害，或者会起到更有益的针砭作用。

以上所写，恐怕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吧。因为可能印在卷首，从形式上看，也就是所谓《序言》或《前言》了。



1988年5月11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书籍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历史发展	(1)
(一) 书的先行时期	(1)
(二) 初期的书	(2)
(三) 正式的书	(6)
第二章 书籍的本质与作用	(16)
(一) 书籍的本质	(16)
(二) 书籍的作用	(20)
(三) 书籍的特征	(27)
第三章 我国书籍编辑的产生和历史上的书籍编辑	(33)
(一) 最早的书籍编辑	(33)
(二) 古代的书籍编辑	(37)
(三) 近现代的书籍编辑	(55)
第四章 书籍编辑的职能和任务	(76)
(一) 书籍编辑的职能	(76)
(二) 正确执行书籍编辑的职能	(83)
(三) 社会主义书籍编辑的任务	(85)
第五章 书籍编辑学是一门科学	(94)
(一) 书籍编辑学的特性	(94)

(二) 书籍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和根本任务	(104)
第六章 书籍编辑工作者的作用和条件	(117)
(一) 书籍编辑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117)
(二) 书籍编辑工作的特点	(122)
(三) 书籍编辑工作者的基本条件	(128)
第七章 书籍编辑工作的计划管理	(151)
(一) 书籍编辑工作计划管理的意义	(151)
(二) 书籍编辑工作计划管理的特点	(155)
(三) 选题计划	(160)
(四) 发稿计划	(173)
(五) 计划的落实与检查	(177)
第八章 组稿和作者工作	(183)
(一) 组稿工作的重要性	(183)
(二) 组稿工作的要求	(185)
(三) 作者工作的要求	(195)
第九章 书稿的编辑处理	(202)
(一) 审稿的意义和制度	(202)
(二) 审稿的基本要求	(212)
(三) 退稿的原因和要求	(227)
(四) 退修改的前提和要求	(230)
(五) 加工和整理工作	(234)
(六) 发稿和看样工作	(238)
后 记	(243)

——第一章——

书籍的起源及其在我国 的历史发展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同书籍的传播知识是分不开的。书籍本身，从形式到内容及其作用，也是有着发展阶段的。我们对于书籍的概念，一般总是指用纸张印上文字或图画等符号并装订成册的东西。然而最初的书，它的物质形态并不是这样的，内容也比较单一，它的作用，也没有今天这样完备。

作为书籍的编辑工作者，对于书籍的发生发展应该有个基本的了解。我们不妨先从我国书籍物质构成的几个阶段谈起，同时结合说明书籍内容、作用的发展。

如果连具有书籍作用的最初形态也算在内，书籍的物质形态，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它的物质构成，先后不同，后一种物质载体出现以后，以前的物质载体还同时存在相当时期。现在分别简述如后。

(一) 书的先行时期

人类传授知识，最初是通过语言，进行口传。但是口传有很多缺点，语言说过了就消失，日子长了，听的人会记不起了，或者记错了；于是，人们就利用实物来帮助记忆。结绳记事就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办法。人们把绳子打成各式各样的结，

用结的大、小、多、少等等来表示不同的含义。《易·系辞》中就说：“上古结绳而治。”在近现代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和外国有些民族中，都还发现过结绳记事的事实。

除了结绳记事，还有刻木记事。就是在木头上刻记号，用不同的刻划，来表示不同的含义。迄今我国少数民族中，如拉祜族等，都有这种刻木保存下来。

结绳和刻木，象征着过去发生过的事，年老的人每年要向年轻人讲解，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人们知道本族祖先的历史。我国的佤族，每当吃新米的时节，就要这样做。汉族古书中的一些远古传说，就是通过这类方式流传下来的。

此外，还用别的实物作记号，或把几种实物扎在一起作记号。

结绳和刻木，以及利用别的实物作大家公认的记号，当然还不是书，但是已经可以保存下来，可以传递到远方，打破了语言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而有书籍的作用。所以，我们讲书的历史，也把它算上，作为书的先行者。

（二）初期的书

（1）将文字刻在甲骨上

用实物作记号表达意思，毕竟是很原始、很粗略的一种方法，需要有一种能够完善地代替语言的符号，文字终于产生了。最初的文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在原始社会里，图画也曾被用来表述思想，作为信息传递。比如约人打猎，就画上弓、箭，射向一头鹿。把图画简化，就是最初的文字——象形文字。我国的汉字，就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发现的一处原始社会的遗址，在出土的陶器

上，刻划着一些简单的符号，看来不像是花纹，而有点像文字，虽然搞不清它的含义是什么。这种陶器，是 6000 年以前的遗物。

根据出土文物并经考古证实，河南省安阳县殷墟发掘出来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是我国早期的正式文字。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是 3500 多年前殷商时代的遗物，所刻的文字是我国早期的正式文字（华夏族的）。这种文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完善，可见它的起源应该更早。不过，说它是汉字的老祖宗，是当之无愧的。

刻有文字的甲骨，已出土的有十几万片，单字有 4000 多个，经专家们多年研究，可识的约 1/3。

殷代的统治者很迷信，他们经常祭祀祖先和上天，并卜问吉凶。诸如战争能不能取胜，打猎有没有收获，庄稼收成好不好，风雨有没有，以至疾病、婚配、妇女生育等等，都要烧灼甲骨，卜问上天。卜问的事情和吉、凶预兆，就写刻在这块甲骨上。如果事情应验了，比如战争果然胜利了，俘虏了多少人等等，也刻在甲骨后面。有时举行祭祀，杀了多少牲口和奴隶，也要记载下来。这样的一片片甲骨文，反映了当时殷商王朝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生产、生活状况，成为历史的记载，这些就是甲骨文。当时由史官保管、存档，为了便于复验，自然要按一定类别和年份的先后整理、排列、编辑起来。虽然这些甲骨文件属于档案性质，主要是记录事情，不是用来传授知识和思想的，但是流传下来，使后人了解当时人们的政治社会活动和思想意识，以及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供给后人以历史知识，起了积累文化的作用。因而也可以说，这些甲骨文件是最初的书籍。

这时候，中国的中原一带，社会早已进入奴隶制时代。所

以，书是文明的产物，也是在阶级社会才产生的。

(2) 将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

奴隶制时代也称青铜时代，因为青铜冶炼是奴隶制时代生产力的标志。奴隶主贵族使用的用具，主要是青铜器。如祭器（礼器）、酒器、食器、盥洗器、乐器和武器等。其中的祭器是在举行典礼或祭祀用的，从而蒙上了一层神圣庄严的色彩，成为奴隶主贵族的传家宝，长期保存，并赋予了社会意义，成为统治权力的象征，被称为“重器”。传说禹铸九鼎，这九鼎成为最高统治权力的标志。所以，当时奴隶主贵族凡发生重大事件要永留纪念的，或者有重要文件需要昭告天下和长期保存的，便铸一件青铜器，把事情和文件刻或铸在上面，这就是青铜器铭文。如现存最大的商代文丁时期的司母戊鼎，重达 875 公斤，是商王为祭母（名戊）而铸造的。西周康王二十三年铸的大盂鼎，是西周大臣孟为了祭祀先祖南公而铸造的，上面记载了康王的训诰和赏赐的酒、衣履、车马以及奴隶数目，铭文有 291 字。西周恭王时期铸造的召卣，记载了召同另外两个奴隶主为了卖买奴隶而打官司的事，其中载有奴隶的价格，共有铭文 410 字。又如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晋国的赵鞅，都曾把国家的刑法铸在鼎上公布，称为“刑鼎”。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不限于鼎，尊、簋、盘、镃等等，都有刻铸铭文的。

出土的青铜器，其中有的经科学测定，绝对年代有在 4000 年以前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金文（即刻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比甲骨文还早。其实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是我国早期的文字，而且都已比较成熟，形成一定格局，都很难说哪一种是最早的文字。

青铜器已发现了好几万件，其中有铭文的有 1 万多件。铭文也以记事为主，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

况。它的作用，与甲骨文相同，成为历史的记载。尽管青铜器本身另外有着它的用途，它的形制同现在的书更是大为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同样起着书籍的作用。

(3) 将文字写、刻在玉、石上

原始社会时期，出于原始宗教思想等原因，人们常在石壁上作画。到了阶级社会，不少人把文字写、刻在玉、石上。1965年年底，在山西省西南部侯马地区一处属于春秋时期晋国的地方，出土了大批有文字记载的玉片和石片。形状是上尖下方，长18到32厘米，宽从不到2厘米到4厘米，厚不到1厘米。字用毛笔写，一般是朱红色，有少数是黑色。这是晋卿赵鞅为了反击守旧的奴隶主贵族的进攻，和同宗人结盟的誓约，被称为“侯马盟书”。其中可辨识文字的有500多片，反映了古代社会变革时期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

石刻文字现存最早的是石鼓文，还是唐朝初年在今陕西省宝鸡地区发现的，共10个鼓形的石墩，每个各刻四言诗一首，大意是歌咏秦国国君游猎的。现在，这些字迹有不少已经磨灭了，什么时候刻的也不可考了。

刻石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流行。《管子》中说到，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在泰山看到很多“封禅”（一国最高统治者祭天地的大典）石刻。《墨子》书中则有“镂于金石”的话，金指青铜器，石就是石头，镂就是刻。刻石是为了纪念，也为了宣扬。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多次到各地巡游，同时刻石宣扬自己的功业。现存这种刻石，只有山东胶南县琅琊山的残石了。

在汉朝，刻石风气非常盛行。人们把刻在山岩石壁上的，称为“摩崖”；刻在长方形大石上的，叫做“碑”。这种碑上的文字，除了少数是官方文书，大都是纪念性质的，都成了历史资料。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教科书——《诗》、《书》等古书，被奉为经典，并成为行为的准则，贯彻在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司法官断案决狱，也根据经书文义。而经书经过秦火，后来又发生今、古文经之争，再加转辗传抄，各种本子的文字不尽相同，以至于打官司的人各据有利于自己的经文为词，争执不下，司法官也难决断。公元175年（汉灵帝四年），根据学者蔡邕等建议，把《诗》、《书》、《周易》、《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七种经书，刻在一块块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前，作为标准版本，这是名副其实的石头书了。

（三）正式的书

（1）竹、木简

用竹片和木板作书页，把文字写在上面，按次序编好，串连并捆扎起来，可以认为是正式的书了。一块竹片叫做“简”，许多简编在一起叫“册”，“册”也写成“策”，同音假借。分册用韦编串起来，韦就是纬，也就是丝绦或麻绳，有人认为是皮绳。一册就是一篇文章。一块木板叫“版”，写了字的木板叫“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就叫“方”。短文章写在木板上，一块就够了；长文章就用简册。简也有用木片做的。古代通信往往用一尺见方的牍，所以信件有个古老名称叫“尺牍”。版比较阔，便于画图，古代以此画地图。版图所画，无非是国家疆域，所以也把国家的疆域称为“版图”。版还用来记录物品名目以至户口。

简的长短不一，一般是长简写经典，短简写其他。最长的3尺，是写法律的，所以古时叫“三尺法”。还有起棱角的木

条，可以竖立起来的，叫做“觚”，是教儿童识字用的。

《尚书·多士》中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个“册”和“典”，就是记载当时国家大事的简册。册是串连捆扎甲骨或竹简的形象，典是把册放在供几上的形象。战国时期，各派学者用简册著书是比较普遍的。从物质条件来说，版、简的材料是木板和竹片，不难取得，利用也方便，价格低廉，这是个有利于著作的因素。当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旧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已经动摇了，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起来，他们在经济上改变剥削方式，政治上培养自己的势力，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各种先进或保守的学说纷然争鸣。过去垄断在少数奴隶主贵族手中的学术文化，所谓“学在王官”，也向下层统治阶级开放了。孔子首创私人讲学，正是顺应潮流趋势的表现。当时的诸子百家，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立场，发表各种政治、经济的主张，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他们到处游说、宣传，并著书立说；还用来教导学生，建立学派。这时候，从书籍的作用，即传播思想、知识来说，已有充分的发挥。原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只是为了记录和纪念而刻铸的，现在也起了积累文化的作用。书籍的基本作用，可说已臻完备了。

用竹简著书，是用毛笔写的，这叫“笔”。写错了，或者要改，就用小刀把字刮去，这叫“削”。新竹易遭虫蛀，湿度又高，所以先要在火上烘干。烘时会渗出像汗一样的水份，烘后竹青转成黄色。这道工序便叫做“汗简”、“汗青”或“杀青”。简册是有相当分量的，又占一定体积，虽然如此，好学的人还是喜欢收藏，藏书家在那时就有了。战国时学者惠施家里的藏书，据说可以装5辆车子。“学富五车”后来就成为指有学问者的成语。秦始皇处理政务很勤快，他规定自己每天要看一石重